

WEIZUGUO
DISANCITENGFEI
ERPIEBO



为祖国
第三次腾飞
而拼搏

李燕杰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为祖国第三次腾飞而拚搏

李 燕 杰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 杨钧天

为祖国第三次腾飞而拼搏

李燕杰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边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.375 字数30,000 印数0,001—3,000
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7103·1340 定 价：0.25 元

为祖国第三次腾飞而拚搏

——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日向浙江省大学生报告

共青团浙江省委让我在今天的会议上做个发言。我发言的题目是《为祖国第三次腾飞而拚搏》。

我在前几年有个发言，叫《德识才学与真善美》，在这个发言中有两句话：“青年是我师，我是青年友”，这些年，我结识了不少青年朋友，也结识了一些少年儿童，所以，我今天从一位小女孩说起。她的名字叫童靓，当时只有八岁，她从小就喜欢写大字，被当地称为小小书法家。据传说，她写了两个条幅，一个条幅是“振兴中华”，一个条幅是“腾飞”。她把这两个条幅送到老书法家手里，请老先生看看。老先生看后说：写得这样苍劲有力，能是一个小女孩吗？如果是一个八岁小女孩，我让她担任书法家协会的会长。于是就把小童靓找来，当场挥豪，挥洒自如写得苍劲有力。这位老先生却忘记了刚才许下的诺言，反而说：“小小年纪，为什么不一笔一划写楷书，为什么一上来就写腾飞呢？”我自己虽已五十六岁了，但老年

人的优点没增长多少，青年人的缺点还残存不少，爱打抱不平。我就对助手说：“你请小童靓给我写两个条幅”。当时我正要到欧洲去，就把这条幅带去了，告诉全世界人民，我们中华民族后继有人，而且是大有人在。这条幅当然给中央领导同志看了，大家都很高兴。有一天耀邦同志谈到了中华民族的近百年历史，他说，有人一谈到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历史，认为只是灾难重重的历史，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，因为，这一百年的历史虽然有灾难，还应该看到这是我们民族腾飞的历史。第一次腾飞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。第二次腾飞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毛泽东同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。耀邦同志接下去又说，我们接下来的是2000年，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，实现四个现代化。这是第三次腾飞。重任在肩，而且是任重而道远。耀邦同志还讲：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社会主义强国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伟大的理想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志气。什么是理想？什么是志气？什么叫有出息？耀邦同志说：就是要为人民的利益奋发进取，要建功立业。

近三年中，我走了欧美国家的一百零一个城市，行程等于绕地球三圈。一般的代表团到了西方国家总是要参观参观吧，象白宫、五角大楼等等，一些名胜我都去了，有些其他代表团不能去的地方，不敢去的地方，我也去了。因为我有一个“特殊”的身分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是带“长”字的，只有我本人是带“员”字的——“教员”，在代表团中是团“员”。在国内带“长”字的行动比带“员”字的要方便，在国外带“员”字的行动可要比带“长”字的方便得多。别人不能去的地方，不便去的地方，我也去了。我们到了许多大城市，中小

城市，也参观了农村，到过唐人街、黑人区、贫民窟、印地安人保留区、同性恋区、红灯区，我们还参观了许多大学、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，会见了他们的官方人士，会见了他们的许多科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并作了亲切的交谈。所以今天的发言想讲三个题目：①我们心目中的出国留学人员，②出国留学人员心目中的西方社会，③西方人士心目中的中国大陆。我们心目中的他们，他们心目中的他们，他们心目中的我们。这样就能给同学们展现出一个多层次，多侧面，立体感很强，有声有色，犹如宽银幕的画面。有些同学可能要问：你今天讲腾飞，为什么要讲这些呢？这很简单，要腾飞，首先要考虑到我们的立足点在哪里，同时也要考虑到国内、国际形势如何。如果我们能纵观全球，那么我们的青年才能算是八十年代的青年。小平同志不是讲了不仅要面向现代化，面向未来，还要面向世界？

下面就讲第一个题目：我们心目中的出国留学人员。

我记得1982年第一次出国前夕，常听说我们的留学生出国以后，来到西方的花花世界，有些人变坏了，有些人叛国投敌了。当时，我作为中央慰问团的一个普通成员，出国后心情很紧张，因为我的发言调子那么高，那些出国留学生们能听得进去吗？我在国内走了上百个城市都没栽倒过，如果栽倒在国外国，那么我回国后怎么见江东父老呢？在飞机上，团长说：“李燕杰，请你作好准备，我们快到旧金山了。在那里休息两个小时后，立刻起飞去加拿大的温哥华。第一场请你演讲。”我想我们这儿有团长、副团长，怎么轮到我这个“员”了呢？没想到团长跟我开了个玩笑，团长说：“你在国内号称演说家，你不讲我们带你来干吗？”我想这是责无旁贷了。下了飞

机就直接进了会场。一进会场，就看到左边坐着一大批四十多岁的访问学者，右边坐着一大批二十多岁的研究生。开始，我把调门降了八度，说，在1978、1979年党的三中全会前后，很多人对我们的政策还不太理解。有的人说祖国那样穷，有什么可爱？为什么管她叫我的母亲？我有个学生，叫小金，当时只有十九岁，是77届大学生，他说：“不管母亲多么贫穷困苦，儿女对她的爱也决不含糊。我只喊一声祖国万岁，更强烈的爱在那感情深处。”就这四句话，许多留学生眼角都挂了泪珠，我没想到留学生还挺爱国呵。接着，我讲了音乐家贝多芬的故事：

一天，贝多芬正好在利希诺夫斯基公爵的庄园里，突然来了几个侵略维也纳的拿破仑的军官。他们发现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在场时，马上强迫贝多芬为他们演奏。可是，贝多芬作为正直的爱国之士，断然拒绝。而公爵为讨好侵略者继续强迫贝多芬为他们演奏。这时的贝多芬愤怒到了发狂的程度，一脚踢开小屋的门，冒雨回到了自己的住处。抬眼看到墙上贴着的公爵的画像，余怒未消，一把扯下画像，撕个粉碎，拿起笔来给公爵写信：“公爵，你之所以被称为公爵，只不过由于偶然的出身。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，完全靠我自己。公爵过去有，现在有，将来也有。但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，贝多芬却只有我一个。”历史是公正的，历史也是无情的，公爵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而贝多芬以其高尚的人格，美好的心灵，不朽的乐章，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树立起一座非人塑的纪念碑。

我话刚停，两位学者流着泪走上台来，跟我握了握手，什么也没说——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我们彼此之间是理解的。

从此以后，从北美到欧洲，我走了上百个城市，最后把发

言的调门一下子提高了八度。现在在大会上，我可以说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出国留学学生是二十一世纪的栋梁之材，是大有希望的，是信得过的。一位留学生对我说：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青年的形象，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青年的使命，这个使命正是由它自己所塑造的一代新人去完成，去实践的，这是历史的辩证法。”正如浙江团省委号召的“全省共青团员行动起来，为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做贡献”，让团徽在七·五期间闪光。出国留学人员是代表中华民族的，作为中国人，要让中华民族在全球上闪光，这是不容置否的事实。浙江大学的路甬祥同志在国外的名声很大，他的出现是我们浙江的光荣，浙江大学的光荣。

历史赋予我们以使命。在“一二·九”期间，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，历史赋予那代青年奋起救国的使命，而我们今天的使命是什么呢？青年应该怎样去理解？有人说：当代青年是沉思的一代；有人说：当代青年是垮掉的一代……；我们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。我们认为这一代是崛起的一代，是创新的一代，而且是腾飞的一代，是为迎接腾飞拼搏向上的一代，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回答。

记得那次刚回国，在中南海遇到了姜昆同志。我问：“姜昆，你这次到北美，看到那么多留学生，有什么观感？”姜昆说得特别好玩：“我看他们是插洋队，受洋罪呵。”下边我就举个例子，看看我们的留学生是怎样生活的。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到了美国，写了封长信，信中说：“……踏上美国大地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超级市场上包罗万象的商品，不仅种类齐全，而且商品的分类很细……但是，最使我感到脸红羞愧的是中国商品的原材料、制作都是那么精细，但式样和包装却是

最下等的。每次看到减价的处理品上，很多都写着‘中国制造’。中国人与美国人相比，既不懒也不笨，我是从中国来的，中国人的勤劳、刻苦的精神给我打下了很深的烙印，为什么中国人的商品赶不上外国人的呢？我苦苦地思索着这一问题，寻找着为中国人出力的途径。”出国留学人员告诉我这么一句话：“越是远离祖国，越是感到祖国亲；越是看到别国的科学技术的发达，越是感到肩上的担子重；越是看到世界的复杂，就越感到要学好马列主义。”这是我们留学生的心里话。

这个女孩子，为了报效祖国，又选学了一门功课：商品经济学。在国内要增加一门学科的学习，总要交点学费吧，更何况于美国呢。为了多学一门功课，她走上了勤工俭学的道路。现在中国出国留学生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六岁。二十六岁的人是生在1960年。杭州我不知道，当时北京报上多次宣传吃小球菌——这是从尿中捞出来的呀，说是最有营养的，现在为什么不宣传了呢？！我的儿子是生在1958年，我的女儿是生在1960年，当父母的勒紧了裤腰带为儿女们省下二两粮食，让他们多吃几口。而这些吃小球菌长大的要与那些从小喝着牛奶、吃着面包的外国人比赛，在竞赛中还要取得胜利，这有多难。这女孩子说：“我们开始了勤工俭学的道路。平均每天学习八小时，工作又是八小时。早晨四点钟在零下18℃的天气下，我们踏着积雪去食堂为别人做早饭，尽管广播电视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出门了。深夜12点钟我完成了餐馆的洗碗工作，在黑暗中摸索着回家的道路，不顾在森林中扎在树头上那些红布条投来的阴森的寒光。这些红布条是被流氓强奸以后的女青年偷偷系上去的，告诫后人注意。可我呢，也顾不得许多。每天在震耳欲聋的闹钟声里翻身而起，就开始了一天的功课学习。尽管躺下才一、二

个小时，有时彻夜没有安眠。为了使做工、学习两不误，我尽量去做多花体力、少花脑力的工作。这样，我就可以把工作当作一种体育锻炼，并在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想些学习中的问题，记一些定理公式，因为我们要用比美国学生少一半的时间而要达到他们的中上水平啊！”这容易吗！她这封信的结尾更感人：“在美国留学，免不了有人向我们约会，或是直接向我们求爱，我总是习惯于回绝。有些学生（当然是外国学生）就问：你不习惯美国的生活吗？你不喜欢我们美国人吗？我说：我习惯，我也喜欢，但是我不愿意享受这里存在的一切。我不会抛弃我曾经爱过的，现在仍然爱着的祖国和我的亲人，我乐意享受的是我出过力、流过汗的成果。”美国某所大学的教授都自称清高，他们自豪地宣称杨振宁、李政道、华罗庚都在此读过书。近几年，由于大陆来的留学生都刻苦、努力，成绩突出，他们越来越重视中国大陆来的学生。航空系平时有个纯中国打扮的北京学生，一鸣惊人，直取全系统考第一。那天十多个超级教授来了个联席会议的质疑，这位学生才思敏捷，对答如流，痛快极了。中间休息的时候，他的指导教授私下对别的教授说：要是你们谁继续刁难这位中国学生，谁就是天下第一大笨蛋。通过这些事例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生活，怎样思考的。我再举个小例子，有一个男孩，今年二十一岁，刚到美国。美国的住房条件比我们北京、上海好得多，一个学生就可分到三间的套房。他想：我为何要花那么多美元住这三间房呢？他就写了个小条，贴在楼道电梯的旁边，说谁愿意与我同住，请到某号房间与我接洽。条贴出后，一个美国女孩子就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同学，刚才那条是你贴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“那好，我准备与你同住。我可以教你英文，你可以教

我中文。”这男孩脸刷地红了，撒腿就跑。此事被记者发现，第二天见了报，说中国的学生如此之腼腆，如此之怕女性，腼腆得如此可爱。中国的传统教育下培养的青年人谁见过这世面，不要说他们，就连我都没见过这世面。有些老同志见到我说：“燕杰啊，你从纽约回来，见到我的女儿了吗？”我说：“见到了。”接下去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看她变了吗？”老同志很怕女儿变坏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们许多儿女在国外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，这是客观事实。

在专业学习上，我们的同学在国外是很努力的。在竞赛中许多人是走在前面的。一些名牌大学，象耶鲁大学、哈佛大学，在研究生考试的前五名中，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四名是我们大陆去的。第三名是台湾去的，第五名是东南亚去的。但是也有人偷偷跟我们讲，我发现你们中国人特别会考试。言外之意，我们的学生考试能力很强，但动手能力、思考问题能力很欠缺了。从这一点，我们同学也可吸取些教训。这些留学人员是怎样出去的，我也问过。我问：“小王，你怎么能考出国的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不瞒您说，我是做到了‘四脚落地’。第一是政治思想好；第二是专业学习好；第三是外语水平好；第四是身体好。”

刻苦努力学习的例子很多，我只想讲两个。第一是讲袁禾，她在上海时还只是相当于高中一年级水平的初中毕业生，是个糊纸盒的女工，后来发奋图强，考到了美国深造。到了麻省后就被称为是麻省的一面旗帜。我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，在人类历史上，事业有所成就的并不都是那些生活中的宠儿，往往却是那些遭遇过不幸，能发奋图强的苦孩子。她在攻读硕士学位过程中，发现得了癌症，当时很多人劝她回国，但她说一定要

拿下硕士学位，并且还要拿下博士学位再回国。后来不幸去世。在她死后，美国人专门为她开了个追悼会。在开追悼会那天，会场上还降半旗致哀，尔后当地的奖学金被改为中国留学生袁禾奖学金。另一个例子，一名男青年在北京时，在音乐方面就很有造诣，可是我们国家近年来有一种奇特现象：有些人不管你有多大能耐，有多大本领，就是不能得到承认。所以我国流行着这样两句话“墙内开花，墙外香。国内开花，国外结果。”我走到一些省市经常问，某某是你们重庆的，某某是你们上海的，他们在你们这里表现怎样？结果回答象是商量好的，都是“嘿，他那两下子，我们还不知道”，言外之意就是：他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比他强多了。我想，你这么强，这么棒，我怎么不知道你呀。这个青年到美国没几天就被称为“中国的小泽征尔”，因为他是学指挥的。那天他上台指挥的乐队全是美国人，他披着一件黑黄两色相间的斗篷，操着一根银光闪闪的指挥棒，潇洒自如，风度翩翩、落落大方，随着指挥棒的起落，激昂澎湃的乐曲响彻了整个音乐大厅。许多照相机都争相抢拍这一美好的镜头。当时在观众席上的中国人都含着热泪。一位熟悉他的人说：“他这几年经受了多少考验！艰苦劳作。难以入耳的闲言碎语都被他顶住了……”在法国巴黎，仅去年一年，我们的留学生就拿到了法国八个国家博士学位。

这些留学生的共同语言是这样的：一个受物质支配的人，一个物欲很强的人，一定是缺乏理想、趣味低级、精神生活空虚的人，也是在生活上极为可悲的人。这些留学生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。所以在我离开意大利、奥地利时，这些国家教育部的几位官员对我说：“李先生，你

们应该多派一些人到我们欧洲来。你们为什么派那么多人去美国呢？”我当时觉得不太好回答。这时他又说：“你们师范学院是不是以后多派一些人来？”我说：“我们也派不了，因为我们那里是学英文，没有学意大利语、奥地利语的。”我认为这样回答就行了。没想到他们说：“不会也不要紧。我们这里的人都懂第二外语，我们对你们的留学生是很欢迎的。”这证明现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欢迎我们中国人。但是在五六年、七八年之前，可不是这种景象。我们刚出去的时候，许多外国人瞧不起我们，见到我们总问：你们大陆上还裹小脚吗？你们还有人力车吗？你们家有抽水马桶吗？到考试的前夕，不要说美国的学生，就连台湾的学生也问我们：你需不需要我给你一些辅导？几年过后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到了考试前，许多台湾青年、港澳学生都请大陆的留学生担任他们的辅导员。

接下去再讲讲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。有一天，旧金山的一位青年朋友问我：“李老师，你今天想不想参观这里的新华书店？”我马上回答：“我不想去了。”为什么呢？我在大陆经常去新华书店，我为什么到美国来逛新华书店呢？这个青年人说：“不，你一定要去。这个新华书店是一位八十岁的广东老人开的。在中美关系还不大正常时，这位老人家就从香港转来了一大批大陆书刊，在旧金山卖。由于卖大陆书刊，他的书店被反动分子砸了七、八次，他的太太有一天上街被反动分子的车活生生地撞死了。但是这位老人说：‘只要我在，就要那唐人街上的反动分子不得安宁。’”那天，我们就开着车去了。那书店门上写着四个方方正正的大字“新华书店”。那天老人家正好在店里。我说：“老先生，我代表我们慰问团来看望你。”当场老人家就流下了眼泪。这位老人递过一张名片，是

白底红字，名字写在很不起眼的地方，中间写着新华书店，而且还标明他卖什么书。他卖四种报刊：《人民画报》、《中国建设》、《北京晚报》，最后一份是《红旗》杂志。如果不是对祖国的热爱，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卖《红旗》杂志。当时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。我想起了鲁迅的《一件小事》中说到的：刹时这位老人的形象在我的眼中突然高大起来。他的书店里还摆着《邓小平文选》，而且有几种版本：大陆的平装本、精装本、香港本和他们国外的。他这是为什么呢？而那留学生带我去看又是为什么呢？

出国留学人员的很多想法与人们并不一样。因为他们说：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一位留学生说：在国内时，如果谁说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我准会说这是“四人帮”的语言。但到了美国，我懂得天下乌鸦就是一般黑。下面，我再讲两个例子。我到了美国，就有一领导同志对我说：“李燕杰，你可要小心，现在王××之流正在这一带活动。”王××在加拿大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，立刻到美国办了个《中国之春》，搞反动宣传。这个人很聪明，也很有才气，但是不用在正道上。当时有个同志提醒我：你要小心，说不定在哪个会议上，他们会站出来向你挑衅的。当时，我想没什么，我小时就学过《孙子兵法》，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”那天，我到书店买了两本他办的杂志。谁想，没过几天就有一位外国朋友说：“李先生，请问你《中国之春》讲的是真的呢，还是假的？”我想：当着那么多人回答他这条是真的，这条是假的，这条是不真不假的，这不是废话吗？我要前进一步，就得退两步。我说：“王××讲的，是真的，但是他讲的是过去完成时，要听就听本人的，本人现在讲的是现在进行

时。”（掌声）王××是1977年出国的，骂的都是“四人帮”的那个时代，他把什么都算在我们身上了，这合适吗？接着我就讲现在大陆的大好形势。作为我能做到，还是件小事，毕竟本人已是五十多岁了。有一个中国小伙子看见王××在讲演，后边坐着六名彪形大汉，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警察。这小子一进门就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王××，你到美国来搞所谓的中国之春，宣传所谓的真理。你既然是宣传真理，那你为什么要带六名彪形大汉呢？你有种把警察撤掉。”六名警察觉得无趣，只得下去了。接下去他又说：“中国之春只能在中国。”接着又面向美国人说：“我们中国之春怎么会在你们美国呢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”美国人也想：“中国之春应在中国，怎么会跑到美国纽约、华盛顿呢？”这小子接着掏出一封信，是王××爱人写的，质问他既然追求所谓真理，为何要遗弃自己的妻子和女儿？这小子对美国人说：“在美国乱搞男女关系不算违反法律，但他已犯了重婚罪，违反了美国的法律，你们能允许吗？”美国人想：是的，支持了半天，却支持了一个重婚犯。小伙子接着说“按中国传统说法，我们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中国八十年代的王世美。”从此以后，王××搞的《中国之春》分裂了。现在美国既有《中国之春》，又有《中国之声》。留学生说：“一加一等于二，但由于自相矛盾，一加一也就不等于二了。”中国留学生对他们嗤之以鼻，说：“你们要我们跟你走，我生是中国人，我死是中国鬼，我学成以后回国建设四化。至于你嘛，何去何从，你自己选择。希望，希望只能在中国土地上，未来就在我们这一代栋梁柱上。”这是中国留学生对王××的回答。这许许多多的事例给我很大的启发，取之以国内，用之于国外；又可以取之于国

外，用之于国内。我再讲一个小故事。有一个男青年在国内担任过司机，既会开车，又会修车。在美国社会，讲开汽车、买汽车相当容易。花四至六百美元就能买一辆旧的小卧车。所以好多留学生，包括一些女同学也开着小车。买车容易、开车容易、修车难。这小伙子因会修车在留学生中特别有人缘。而且他们天天与台湾、港澳学生打交道。中国大陆学生、港澳学生、台湾学生坐在一起，经常是亲如一家的，都是炎黄子孙嘛。每次开茶话会都把这小伙子请去。但台湾学生毕竟是台湾学生，也有个别的职业学生。那天正开着茶话会，从外面走进了一名台湾学生，进来不一会就挑衅了，他举了一系列的例子，说大陆什么什么不好，台湾什么什么好，最后讲得很难听。我们的男青年在国外是比较腼腆的，一般说难听的话忍耐一下就是了，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了。所以他们也经常用一些带刺的话说我们，我们毕竟比较穷啊！但那天这种情形使这小伙子突然一下火了，拍了桌子，说：“今天你们是开茶话会，还是摆鸿门宴。既然你们不礼貌，也别怪我不客气。”然后也义正辞严地摆了一系列台湾与大陆的对比，讲到关键时刻，他慷慨激昂地说：“台湾的经济生活虽然比大陆好一些，但是你们是仰人鼻息是靠美国人拉巴起来的，我们大陆十亿人口是自己十亿双手干出来的。如果我们大陆象台湾那样离开美国不能活的话，请问，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养得起我们十亿人民。”说得慷慨激昂，简直是诸葛亮舌战群儒，说得那台湾青年瞠目结舌，无言以对，最后不欢而散。台湾青年说：“真没想到大陆来的书呆子还是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。他一定受过他们中央演讲团的训练。”这样的故事很多，他们是迎接多方面的挑战。所以说出国谈何容易啊！我想现在在座的青年都有这种想法，

小学生看中学生，中学生看大学生，大学生则看准了研究生和留学生。研究生和留学生虽然是少数，但他们是精华中的精华，对广大青少年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。

下面我再给大家讲这么几个小例子，把第一个题结束。我特别爱吃我们中国饭菜，不爱吃西方的牛奶、面包。那天中午我到中国留学生家里吃午饭，我一进门就看见小伙子桌上放着一张挺漂亮的女青年的照片。我看后问：“这是你爱人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是我的未婚妻。”墙上有个条幅，我问：“你为什么要贴这样一张条幅呢？”我惯于突然袭击。他说：“这是我未婚妻的父亲写的。”回头再看看他的摆设，美国那儿的学生宿舍都铺着地毯，他的地毯上放着讲义、笔记和录音磁带，磁带上写着“贝八”、“贝九”（贝多芬第八、第九交响乐），没有乱七八糟的。我看到这确是一个刻苦学习的环境。然后看到在他的书架上还摆着个鲁迅的头像，远渡重洋还背着个鲁迅像，真有些不可思议。最后，我就把他墙上写的条幅抄在笔记本上。那条幅写的是：“应知天地宽，何处无风云。应知山水远，到处有不平。应知学习艰，在乎点滴勤。尤其难上难，锻炼品德纯。人民培养汝，一切为人民。革命望坚定，永作座右铭。”这是陈毅的一首诗。当时我很感动。这里有对祖国的热爱，有对人民的怀想，也有对爱情的坚贞和对鲁迅的崇敬。

那天，到了女生宿舍，我一进门就看见墙上写着两个大字：“慎独。”我问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那女生就对我讲：

“这是我出国前我爸给我写的。他对我说‘人的道德和纪律观念，我把它分成四等次。第一等次是不管有没有人在，不管有没有道德规范和纪律规定，我们都做最好的人，从严要求自己’”